

平田茂樹

久保田和男

山根貞生

山崎聖一

丁又昇

劉江

滕永福

伊藤一男

小田章

姜鵬

周云蓬

小林隆道

康鵬

陳曉偉

馬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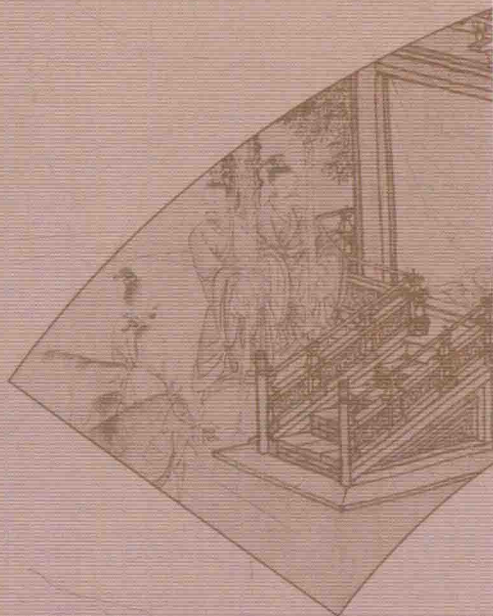
丁磊

飯山和保

溫海清

十至十三世紀东亚史的新可能性

——首届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论文集



余蔚 [日]平田茂樹 溫海清 主編

中西書局

海外僑

十至十二世紀東亞史的新可能性

—— 首屆中日青年學者遼宋西夏金元史研討會論文集

余蔚
〔日〕平田茂樹 溫海清 主編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首届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论文集/余蔚，(日)平田茂树，温海清主编. —上海：中西书局，2018.9
ISBN 978-7-5475-1468-9

I. ①十… II. ①余… ②平… ③温… III. ①东亚—中世纪史—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31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1333号

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

余蔚 [日]平田茂树 温海清 主编

责任编辑 吴志宏

装帧设计 黄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200040)

印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28

字数 416 000

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1468-9/K·273

定价 108.00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64709974

序

“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系列会议的发起,源于2015年10月一次会面中平田茂树教授的提议。日本国内,学界活动之频繁与稳定,一如既往,但若能获得更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在视界的拓展与议题的丰富上,还有相当大的余地,此于青年学者尤然。余心有戚戚焉,中国的青年学者,对国际交流的需求,并不稍弱。

而我又深感,跨“国”之外,跨“界”的沟通,也有加强的必要。在我们所关注的10—13世纪,宋史与辽金史、西夏史、蒙元史这几个“界”,在研究机构密集的个别城市,向未缺乏互动,但就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各个“界”之间的壁垒还是较为明显的。尤其对于青年学者来说,他们不乏学术交流的热情,只是需要一些机会。

基于这两种交流的需要,平田教授与我都感觉,建立一个交流机制,为中日这两个重要的研究阵营、为研究10—13世纪各个朝代的青年学者的互动,提供一个长期运转的平台,是值得一试的。这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日本宋代史研究会合作举办系列会议的初衷。

第一次会议,我们并没有提出比较明确的主题,而是以一个开放式的“东亚史的新可能性”,昭示我们对于新议题的期待,也是为了便于给多方的互动以更大的空间。至于最后汇集起来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应当强调:

(一) 对于旧史料的新认识以及新史料的开拓,从多个角度作出尝试,譬如西亚文献、古地图、佛藏的运用;

(二) 拓展视野,对传统议题重新进行审视;

(三) 开发研究领域,对于多个政权并立的10—13世纪,尝试着打通朝代界隔,关注诸政权的互动,而不是局限于单一政权内部,亦即,要做时代史,而不是朝代史。

但是,同样是在这三个方面,仍然有拓进余地。我们的评议专家虞云国教授指出,在开发前人关注很少的“新史料”的同时,对于传统文献,我们的关注与利用的力度,尚待加强。比如,文集便是一个更为丰富、更有探索与开发价值的资料宝库。

在研究的视野上,姚大力教授认为,此次会议的中日两方,分别呈现两种取向,中国学者倾向于从一个具体问题着手,细究其脉络,或致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日本学者比较愿意从一个大背景下定位,找一个具体问题去做,一旦把握不好,便难以落到实处。若是两种视野能作一个平衡,既有具体问题的深入、精确的探求,又能在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将思索的广度与高度更推进一层,就更如人意了。我想,这便是两国学者聚首于此的主要动力之一。

而研究领域的开发,作为我们这个平台最主要的目的,此次虽不乏相关尝试,如朝代衔接之际的史事、政权之间的交通,然而,融汇的力度若有不足,碰撞的火花稍欠炫目。关键的缺失之处,虞云国教授认为,在于新解释与理论架构,包伟民教授则以“大问题”三字来点明。亦即,“时代史”的意识与大方向上的共鸣,仍俟将来续有提升。

毕竟还是首次尝试吧,两三天的聚首,恍若刹那,即便当时有许多的反思,但磨合与共进,尚需时日。时隔年余,在我们的论文集中,已初见改进的效果,资深学者与青年同行在会上的评议,尽量被吸收到这些改定稿中。而我们在系列会议的后续策划中,也给出了较明确的主题,以俾与会青年学者的议题更为集中,互动更见成效。如第二届会议的“新史料”与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会议的“空间”,给出了共同的方向,那么便有了合力的基础,我们这个平台,就能多起一点作用。

承蒙平田茂树教授、久保田和男教授慨允,我们也收入了这两位日方评议专家在会议期间的演讲论文。对于他们,以及同样为本会议投入许多心力的虞云国、姚大力、包伟民三位教授,我们要致以特别的谢意!

余蔚 谨识

2018年8月

目 录

从边缘社会看南宋士人的交往和信息沟通

——以魏了翁、吴泳、洪咨夔的事例为线索

..... 平田茂树 胡劲茵 译 / 1

辽中京大定府的建设与空间构造

——11至13世纪东亚都城史研究的可能性

..... 久保田和男 郭万平 译 / 29

何人? 何时? 何地?

——后周至北宋初原型民族主义再考

..... 山根直生 山口智哉、曾美芳 译 / 46

宋代的朝贡与贸易 山崎觉士 山口智哉 译 / 85

宋代御药院机构与职能考论 丁义珏 / 110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见荫补拟官文书类型再考释..... 刘 江 / 134

直睿思殿与承受官

——北宋末的宦官官职 藤本猛 王海燕 译 / 151

南宋建立时期的中央政府和陕西地区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高宗《登极赦书》

..... 伊藤一马 田由甲 译 / 183

再论《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

——对南宋地方志编纂变化的理解..... 小二田章 邹笛 译 / 200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

——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姜 鹏 / 218

从《证类本草》到《本草纲目》

——10 至 13 世纪中国本草学的特点及影响 周云逸 / 244

显隐相交

——宋末元初的陵阳牟氏与《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小林隆道 / 256

马卫集《动物之自然属性》中的契丹“都城”

——兼谈辽代的东西交通路线 康 鹏 / 277

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

——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 陈晓伟 / 294

金元汪古马氏的景教因素新探

——显灵故事与人名还原 马晓林 / 321

从《王公祠堂碑》来看王积翁使日问题 于 磊 / 335

《西隐文稿》所见元明交替与北人官僚 饭山知保 / 347

元代江南三行省“万户路”问题析考

——江南镇戍制度的另一个侧面 温海清 / 382

作者所在单位 / 438

Contents

- Hirata Shigeki, The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s of Elit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Southern Song China; with the Focus on Three Cases of Wei Liaoweng (魏了翁), Wu Yong (吴泳) and Hong Zikui (洪咨夔) / 1
- Kubota Kazuo, The 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Chung-ching (Ta-ting-fu 大定府) of the Liao;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Capital Cities in the 11th to 13th Centuries / 29
- Yamane Naoki, A Reconsideration about the Proto-Nationalism in Houzhou and Sung China / 46
- Yamazaki Satoshi, Tribute and Trade in Song Dynasty / 85
- Ding Yijue, A Study on Yu-yao Yuan (御药院) in Song Dynasty: Centered on Institution and Functions / 110
- Liu Jiang, A Re-study on the Appointing Document by Yin (荫) Privilege in the *Song Xibei Bianjing Junzheng Wenshu* / 134
- Fujimoto Takeshi, Zhi-Ruisidian (直睿思殿) and Chengshouguan (承受官): The Eunuch Posts in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 151
- Ito Kazuma, Shan-hsi Region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mmediate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On the General Pardon in the Khara-Khoto Documents / 183
- Konita Akira, Reconsidering *Qiandao Lin'an zhi* and *Chunyou Lin'an zhi*: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in the Editing of the Local Gazetteer in the Southern Song Era / 200

- Jiang Peng, The Expression of Sima Guang's (司马光) Political Ideas in Historical Compilation: From the Edition on the Original in *Zizhi tongjian bu* / 218
- Zhou Yunyi, From *Zheng Lei Ben Cao* to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Herbalism from the 10th to 13th Century / 244
- Kobayashi Takamichi: Mou (牟) Family from Lingyang (陵阳)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ong to Yuan / 256
- Kang Peng, Studies on the Capital of Khitan Recorded in *The Natural Properties of Animals* by Marvazī (马卫集) and the East-West Transportation Route of the Liao Dynasty / 277
- Chen Xiaowei, An Examination of the Nabo (捺钵) and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a Nomadic State: Uncover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Si Lou" of the Early Liao Dynasty / 294
- Ma Xiaolin, New Evidences on the East Syriac Christian Elements in the "Mar" Family of the Öng'üt Tribe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Period: A Miracle Tale and Anthroponymy / 321
- Yu Lei, Discussion on A Diplomatic Envoy Sent to Japan led by Wang Jiwen (王积翁) Based on the Stele of Wang Family / 335
- Iiyama Tomoyasu, "How Did the Mongol Rule End?: The Life of Song Na (宋纳) and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in North China" / 347
- Wen Haiqing, A Study on the "Tumen-Prefecture" in the Jiangnan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 382

从边缘社会看南宋士人的 交往和信息沟通

——以魏了翁、吴泳、洪咨夔的事例为线索

平田茂树

胡劲茵 译

引 言

近年的宋史研究越来越重视书信材料的使用。这当中的理由有若干。其一,以往的正史、实录、会要等史料产生了大量的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近年转移到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焦点,亦明确展现出通过书信、日记、题跋、序、记等材料探讨人际关系与网络等方法论取向。举个例子,宋代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朱熹和其他的思想家、弟子之间的通信,事实上也发挥了一种讲学的功能。此外,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北大史学》第20辑,2016年“宋金元时期士人的书信往来与讯息沟通”专辑收录的2014年牛津大学 Pembroke Workshop 举办的“Letters and Notebooks as Sources for Elite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900 – 1300”研讨会及其成果,也体现出对书信材料研究的高度关注。

笔者近来以宋代书信为资料,致力于研究宋代士大夫如何进行交流,并构筑起什么样的关系。本论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在边缘社会中,宋代士大夫的“知”是如何以书信为媒介进行建构的。作为探讨对象的是魏了翁、吴泳、洪咨夔这三位南宋士大夫官僚、文人和思想家。

在进行阐论之际,我想先提示一下本论文的视角。第一,是宋代士大夫复合和多层的网络结构。关于本论文所探讨的魏了翁,我已发表过数篇论

文,有关围绕着他的人际网络,亦已发表过个人看法。前稿《南宋士大夫のネットワーク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魏了翁の“靖州居住”时代を手がかりとして—》^①所述魏了翁的人际网络,兹引论点如下:

关于四川的士大夫,陈松已有详细的分析,他们通常被认为通婚圈狭小,四川籍官员差不多都是活动于四川域内。^② 实际上,若以通婚圈这一点来看,魏了翁一族的魏氏和高氏(魏了翁是高氏出为魏氏的养子。都是邛州蒲江人)的通婚圈以邛州为中心展开,极为狭小。^③ 然而,在以书信为中心的网络分析中,显示出他在靖州这个边鄙之地,更进一步说,处在受到“靖州居住”处罚的境遇下,他在不断面向“四川”故里的同时,在全国范围与许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交流。由此不仅可以看到南宋道学的“广域讲学”网络^④和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交游圈”的广域性,还可以看出该时代的人际交流和网络的扩展。

首先必须叮嘱一句,宋代地域社会的士大夫研究,以婚姻网络为中心得到了推进,通过对其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等各项活动和网络的探讨,研究视角从地域史(local history)向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广域”的地域社会)转变。也就是说,以往的地域社会史研究多以一个“州”为

① 参考《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12,2016年。

② 参考陈松《分权统治下における在地社会と広域地方——宋代四川を中心として——》,伊原弘、市来津由彦、须江隆编《中国宋代の地域像——比较史からみた专制国家と地域——》,东京:岩田书店,2013年,第143—177页。四川与其他地域不同,与京师的距离比较远,举行类省试,以替代在京师举行的省试。此外,四川从北宋开始实施特殊的人事法(定差法),小州的知州以下由转运使进行漕选,因而许多四川籍官员皆在四川范围内任官。

③ 参考胡昭曦《诗书持家,理学名门——宋代蒲江魏氏家族研究》,《宋代蜀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顺带说一句,魏了翁的第一位妻子杨氏是资中人(潼川府路),第二位妻子杜氏是成都人。

④ 市来津由彦在有关“讲学网络”问题中指出,吕祖谦倾向于“利用中央的科举和官僚体系,以此为中心进行发展”,而朱熹则除此之外,“不能舍弃生活于地域社会的课题,比较重视这个侧面”,指出吕祖谦之学促进了科举文化的成熟,而朱熹之学则扩大了科举文化的范围。参考市来津由彦《朱熹门人集团形成の研究》,东京:创文社,2002年。

对象,而近年的许多成果变为更加广域的东西,以跨越几个州的地域或者“路”为对象。在道学网络方面,也被指出存在着全国性学术网络的“广域讲学”和特定地域学术网络的“地域讲学”两种类型。并且,近年学者开始关注以文化活动为核心的“交游圈”的展开,^①逐渐阐明这些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网络以血缘和地缘网络为基础的一面,同时又是复合和多层的结合。

第二,是边缘社会的视点。^②有关宋代的科举社会,已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我想介绍一下其中近藤一成的《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③他把南宋的东南地域分为开发边境与开发先进地域两种类型,阐明了前者渐增而后者渐减的倾向。如书中所示,在南宋社会,科举及第人数呈现出以开发边境地域为中心剧增的倾向,而中央或先进地域却未必增加。此外,在近藤的著作中,也对科举及第者众多的四川进行了分析。并且在官员人事方面,正如“八路定差法”(北宋熙宁三年开始实施的官员任用法。关于四川、两广与福建、荆湖南路的地方官选考,由八路转运司代替中央吏部执行,南宋有关两广和四川的选考得以继续)所代表的那样,宋代在中心和边缘(或者边境)实行双重制度。而且,南宋时代地方社会的士大夫在自己的家乡(或者移居地)安家落户,可以说为地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④从边缘而非中心来研

① 相关论文可参考:《“游于艺:十一至十四世纪士人的文化活动与人际网络”会议论文集》,台湾:长庚大学,2015年;《中国传统社会への视角》,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

② 法国年鉴学派泰斗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一书中,将地理空间三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指出“中心”衰退之后,下一个中心将产生于“半边缘”。虽然视点有些不同,青木敦注意到“江西”和“福建”等开发边缘地域存在着许多诉讼,分析经济发展、移民和人口增长等与诉讼社会的关系。此外,南宋也是一个在财政和军事方面不断分权化的时代,长井千秋指出,担负军事财政核心的“四总领所(镇江府、建康府、鄂州、利州)相加起来的财政规模,就算以最低限度的估算,也可以与中央的户部财政匹敌,根据史料,甚至保留有超过户部财政数倍的数字”。以上参考费尔南·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东京:みすず书房,1995/1999年;青木敦《宋代民事法の社会》,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长井千秋《中华帝国の财政》,载《东アジア经济史の诸问题》,京都:阿吡社,2000年,第101—134页。

③ 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

④ 参考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究宋代社会的视点变得重要。^① 而本论文除了地理性的“边缘”问题,还将心理性的“边缘”也纳入了考察的范围。举个例子,魏了翁在“靖州居住”时期的书信(《鹤山集》卷35《答福建史提举弥忠》^②)曾言“自得罪远屏,蛮徭之与居,分与世绝者,有五六年于兹矣。况姓名丑恶,人所嫌畏,故不敢以一字登于诸公贵人之门”,可以窥见他回避与京师中央官员接触的心理。这样的例子并不止于魏了翁,最近浅见洋二的研究成果^③也指出,政治斗争之下苏轼的“避言”正是有意识地避免与中央官员政治接触的行为。本论文所列举的吴泳在湖州、洪咨夔在家乡於潜县闲居九年等例子,其居处在地理上很难说是边缘,但主角们在与朋友、熟人通信时所言、所感之“边缘”,却是就其相对于中央政界的距离而言的。

第三,关注文集所载书信、序、记、题跋等史料的视点。关于书信的有效性,我曾经讲过我的个人见解,^④有关宋代盛行的馈赠品应酬网络,合山究的研究颇有意思。^⑤ 合山在论述宋代开始盛行的馈赠品应酬时指出,“伴随着文人趣味的勃兴,士大夫之间的交游形态也与以往发生变化,逐渐展开崭新的独特交游画卷。兹举几个具体的实例,与人赆行和祝贺生日之际,赠送雅趣之物的习惯得以推广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论文中指出,受到流放处分的苏轼和黄庭坚在流放地接受了许多馈赠品,过着富有文化的生活。此外,上述浅见洋二的论文,以受到政治弹劾之时的苏轼作品为中心,提出“对公层

① 论述北宋首都开封士大夫交流的研究成果,有梁建国《北宋东京士大夫的宅园环境与交游生活》(载《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8—307页),其中指出士大夫的住宅及其附属的庭园成为交流的场所,种植于庭园的花树、古籍、书画和金石等收藏品促进了士大夫的交流。魏了翁和吴泳所居住的边缘社会,虽然有自然风物,但书籍的不足成为一个大问题,使得以书信为媒介进行知识交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② 《全宋文》第30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③ 参考浅见洋二《言论统制下の文学テキスト——苏轼の创作活动に即して》,载《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7,2017年。

④ 参考平田茂树《宋代における手纸の政治的效用——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を手がかりとして》,载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第十集《中国传统社会への视角》,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第45—73页。

⑤ 参考合山究《赠答品に関する诗にあらわれた宋代文人の趣味的交游生活》,载《中国文学论集》2,1971年,第23—47页。

面的社会,亦即以朝廷为中心的官僚社会,采取表面上的‘避言’的方式;而对私,则大量作品都使用更加隐秘的形式进行写作、阅读和传达。因此,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苏轼的诗词创作活动,包括文本的制作、接受以及流传,都苑囿于其‘私人圈域’之内”。这一观点将宋代士大夫以朝廷为中心的官僚世界即“公层面的社会”和由“书信”代表的“私人圈域”区隔作两个世界。暂且不论这种区分是否恰当,^①浅见的这篇文章揭示了在新旧党争之盛期,备受弹劾的苏轼所处之集团如何通过书信或诗词作为媒介“背地里秘密地”进行私人交流甚至馈赠的具体情况。这些馈赠品多种多样,以书信为例,我们发现除了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等书籍之外,同时还存在着许多序、记、题跋、墓志等馈赠应酬的方式。并且,这些馈赠应酬与他们的“知识”建构相关联,在市来的研究成果中亦可看到书信在讲学网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文在以上视点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关于魏了翁的“靖州居住”时期,我已经探讨过,所以本论文将以吴泳为中心并部分参考洪咨夔的事例,通过对照其与已经分析完毕的魏了翁事例之异同,开展本课题的探讨。具体的课题有三个:其一是南宋边缘社会中书信的有效性,其二是边缘社会中的网络与交流,其三是书信与“知识”建构的关系性。

一、魏了翁、吴泳与洪咨夔

本节将简要介绍魏了翁、吴泳、洪咨夔三个人物,并对三者的共通之处

① 书信大体可以划分作三类。第一类,是与公文书性质雷同的书信。据魏了翁的一组书信反映,他在向衙门投送上奏或下达命令的文书时,为了保证公文内容被落实,也会向官员个人发出请求或指示的信件。第二类,是称为“启”的书信,它们一般是遇到赴任或晋升等事时连同一些问候发出的信件,从内容上看,既有私的一面,又对公层面的官僚世界的交往起到润滑油一样的作用。不过,在洪咨夔的“书”中,如《通余尚书天锡书》那样,尽管名为“书”,但和他其他“书”的内容相比,则明显属于问候状一类的“启”文。划分类别时需注意不要简单化。第三类,是真正的“私人圈域”的书信,当中包含有政治、学术、文章等各种各样的私人问题的交流。魏了翁、吴泳、洪咨夔的文集里称作“书”的基本属于此类。而正如浅见论文所分析的,苏轼的例子很好地将书信作为“尺牋”的性质展现了出来。但统观书信整体,浅见所谓“公层面的世界”和“私人圈域”两者是存在重合的情况的。

进行整理。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四川邛州蒲江人。庆元五年(1199)考中进士科第三名之后,知汉州、眉州、泸州等,滞留四川之地长达17年,其间在蒲江创建鹤山书院,推广理学。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于参预围绕湖州之变的济王冤罪论,受朱瑞常的弹劾而遭到“靖州居住”处分。其间,在靖州设立鹤山书院,进行周易研究,完成《九经要义》100卷。史弥远死后,重返政界,历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等。作为南宋代表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为人所知,《宋元学案》卷80立鹤山学案。^①魏了翁的学术交流以及学术的范围很广,日本学者伊东伦厚说“鹤山的本领在于他继承了朱子和张南轩之学,同时在经学尤其是三礼之学的研究上发挥了他的本领”。^②

吴泳(1181—?③),字叔永,号鹤林,四川潼川府中江人。嘉定元年(1209)进士及第,在四川任官,除了担任四川宣抚司、四川制置司的幕僚之外,在理宗朝历任起居舍人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等职。^④

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号平斋,於潜(今浙江临安县)人,南宋有名的诗人、文学家和藏书家。^⑤嘉泰二年(1202)进士及第,崔与之任淮东制置使、四川制置使时曾辟召为幕僚,因反对史弥远被左迁九年有余,理宗亲政后,历任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

在三人之中,本论文重点讨论的是魏了翁和吴泳的关系,而洪咨夔的问题预定另外撰文专门探讨,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洪与魏、吴二人相关的一些情

① 关于思想家魏了翁,参考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关于文学家魏了翁,参考张文利《魏了翁文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② 参考《朱子の後継(上)》,东京:明德出版社,1976年,第8—11页。

③ 王兆鹏认为,吴泳在淳祐十二年(1252)仍然在世,享年七十二岁以上。参考王兆鹏《宋代十三家词人生卒年考辨》,载《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④ 关于吴泳的事迹,参考马际荣《〈鹤林集·札子〉校注译论》,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杭洁《吴泳文学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⑤ 关于洪咨夔的生平事迹,可参考刘荣平、丁晨晨《洪咨夔行年考》,载《中国韵文学》2011年第4期;盛中成《天目山有个“四代鸿儒”、“二代尚书”之家》,载《今日临安数字报》2012年9月21日;侯体健点校《洪咨夔集》之“前言”部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况。魏了翁和吴泳两人虽然同是四川籍出身,但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却是学缘关系。吴泳肄业于魏了翁在蒲江的鹤山书院,二者是师生关系。^① 吴泳的学问本身虽然受朱子学的影响很大,但是高度评价了魏了翁对学问的态度。例如,《与魏鹤山书二》称:“某每谓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为最深,愈于天下之人,何则?文以神志为主,异时选人逐客,蹶于忧患,伤于感慨,耗于血气既衰,困苦而无精采。而侍郎养熟道凝,神全志一,作为文章,天力自到,其趣窈窕而深,其声清越而长”^②,高度评价魏了翁的文章;《答严子韶书三》又谓:“立斋自谪渠阳后,学益造诣,文益和平,不可不审之”^③,很好地表现出他对魏了翁在“靖州居住”时期专心学问的敬慕之情。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亦颇有眉山苏氏之风,在西蜀文士中,继魏了翁《鹤山集》后,固无多让也。”^④认为在西蜀文士中,吴泳的《鹤林集》是一部很好地继承了魏了翁《鹤山集》的著作。

另外,二者之间还有如下的书信往来:

《鹤山集》卷三四《答吴寺丞泳书》;^⑤《鹤山集》卷三五《答吴寺丞泳书》。^⑥ 第一封信说,“某自与吴畏斋作记于成都,今二十年间,所作不下十余处”。魏了翁受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吴猎所托,撰写《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是在嘉定元年(1208),“今二十年间”的记述,以及吴泳出任太府丞是在绍定二年(1229)起的四年间。所以,这两封信写于这段期间。

①《宋史·魏了翁传》曰:“若游似、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门受业”。作为蒲江鹤山书院的肄业者,列举游似、吴泳、牟子才之名。《宣义郎致仕牟君墓志铭》很好地表现出吴泳、牟子才、魏了翁三者的关系。正如其中所谓:“隆井研牟君锡桂尝命其子子才从予游,年二十余,已颖异不凡,予知其所从来远矣。……吾请于同年友太府寺丞吴叔泳状吾父之行,以请铭于夫子。夫子知吾父子者也。”牟子才请自己的学问之师魏了翁撰写父亲牟桂的墓志铭,而请“同年友太府寺丞吴叔泳”(吴泳是嘉定元年进士,而牟子才是嘉定十六年进士,谓之“同年”有些奇怪。或是“同舍友”之误)撰写《状》,可以由此确认,一起师从魏了翁的吴泳和牟子才有着很深的关系。以上参考《宋史》卷437,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66页;《鹤山集》卷78《宣义郎致仕牟君墓志铭》(绍定三年十月),《全宋文》第311册,第230页。

②《鹤林集》卷28,《全宋文》第316册,第227—228页。

③《鹤林集》卷30,《全宋文》第316册,第262页。

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2,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94页。

⑤《全宋文》第309册,第353页。

⑥《全宋文》第309册,第378页。

《鹤山集》卷三七《与吴舍人泳书》，^①吴泳出任起居舍人，是在端平二年（1235），因而是这段时期的书信。

《鹤林集》卷二八《与魏鹤山书一》，^②信中有“校书”的称呼。魏了翁任校书郎是在开禧二年（1206），而蒲江鹤山书院创建于嘉定元年（1210）。吴泳在鹤山书院师从魏了翁，而这封信提到“未有詹拜之日”，因此是成为门徒之前的书信。

《与魏鹤山书二》，^③信中有“侍郎”一词。魏了翁于理宗宝庆元年（1225）任“权工部侍郎”。

《与魏鹤山书三》，^④信中谓“西山出守温陵，鹤山易帅泸州”，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出知泉州，魏了翁出任潼川府路安抚使知泸州，因此是这个时期的书信。

《与魏鹤山书四》，^⑤信中谓“东州惟泸，叙尚可用，兹得来书，乃谓搜练简阅，仅得弩手百人，弩三十枝”，是魏了翁知泸州时期的书信。

《与魏鹤山书五》，^⑥信中谓“某自承侍郎建柵，书檄之礼未尝旷绝，六月十八又拜一书，附成都月递以往，不审曾洞彻穹槛否”，是魏了翁知泸州时期的书信。

《与魏鹤山书六》，^⑦信中谓：“某去冬使人之还肤帅具报，入春以来词头山积，随分又有职事，卒卒无须臾闲，非故于侍郎为简也。朝家厉精，公道日辟，较之前此政令垢玩，上下否隔，不可谓不渐就清明。独是君子用之未尽，小人去之不力，上书论事者，莫不以此为言。所谓用之未尽者，侍郎与真丈也，所谓去之不力者，李知孝梁成大也。”吴泳于绍定六年（1233）“兼权直舍人院”，担任诏敕的起草。引文讲述了理宗开始亲政的“端平更化”情况，又

① 《全宋文》第309册，第414页。

② 《全宋文》第316册，第226页。

③ 《全宋文》第316册，第227—228页。

④ 《全宋文》第316册，第228—230页。

⑤ 《全宋文》第316册，第230—231页。

⑥ 《全宋文》第316册，第231—232页。

⑦ 《全宋文》第316册，第232页。